

纪念「七七事变」五十周年文集

杨正光 熊杰 主编

北京燕山出版社



纪念“七七事变”五十周年文集

杨正光 熊杰 主编

北京燕山出版社

K265.4
9

纪念七七事变五十周年文集

杨正光 熊杰 主编

北京燕山出版社出版

(北京市东城区府学胡同36号)

北京昌平长城印刷厂印刷

首都发行所发行

开本787×1092毫米1/32·印张6·25字数100字千

1987年6月北京第一版1987年6月北京第一次印刷

印数：1—500

ISBN7—5402—0043—X/0·0005/3436·5

定价：1.25元

32156

后来人的心愿

陈昊栋

“七七事变”爆发，距今已有五十年。我们在昔日事变的战场——卢沟桥畔宛平城里，建成了一座抗日战争纪念馆，用以向半个世纪以前为民族解放事业奋起抗争和英勇牺牲的先烈们表示无限的崇敬和永恒的怀念。

北京市中日关系史研究会出版《纪念“七七事变”文集》就是纪念这一历史事件的一个组成部分。与此同时，我们的历史学家也在用文字为先烈们树立丰碑。对历史事件的真实回顾和对历史经验的正确总结，无疑将有助于当代中日人民和青年理解自己的责任，从而激励在新的历史条件下为振兴中华、统一祖国的大业努力奋斗的意志和决心。我想，这本身就是对于前辈英雄光荣业绩的有效纪念方式。

在回顾历史的时候，我们势必要揭露和谴责日本军国主义在半个世纪以前侵略中国犯下的罪行。

同时，我们也注意把深切的同情寄予饱尝了战争苦难的日本人民。我希望中国和日本的历史学家要共同携手开展研究、总结历史的经验教训，并使之为两国广大人民所了解。只要十一亿人民决心维护两国的友谊，那就没有任何力量能把他们拖向后退。中国和日本世代友好的理想，是一定能够实现的。

历史学家的工作是编撰五十年前中华民族奋起的史诗，而我们大家共同的任务是把五十年间持续不断的英雄史诗推向一个新的高潮。做为一个后来人，我的心愿是把这些工作和任务都完成得十分出色，以告慰于前辈的先烈们。

一九八七年三月二十八日

前 言

今年是“七七事变”五十周年，也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五十周年。五十年前，日本军国主义者破坏中日两国人民的友好，悍然在北京丰台卢沟桥挑起事端，发动了蓄谋已久的全面侵华战争。中国共产党针对日本全面侵华，提出了一整套政治主张和军事战略、策略，领导八路军、新四军，团结广大人民，经过艰苦卓绝的斗争，终于打败了日本军国主义，取得了民族解放战争的胜利。这场战争不仅使中国人民遭受了深重的苦难，同时也给日本人民带来了巨大的灾难，使中日两国人民得出一个血的教训，中日两国人民只有相互友好，才符合两国人民的共同利益。

1972年中日两国恢复邦交、1975年缔结中日和平友好条约以来，中日关系发展是中日两国历史上最好的时期，我们两国应共同努力，使两国友好关系不断发展。但是，在日本，仍有一小撮人不甘心失败，企图破坏中日友好关系。为了中日两国世代友好，我们必须使两国人民正确认识中日关系的历史，从中总结历史经验。北京市中日关系史研究会和北京市社会科学院外国问题研究所编辑出版这本文集，就是本着“前事不忘，后世之师”的精神，使青年一代不再重蹈覆辙，让中日两国人民世代友好下去。

本文集所收文章，大部分为1986年8月召开的北京市中日关系史研究会第一届学术年会上提交的论文。

北京市中日关系史研究会

北京市社会科学院外国问题研究所

一九八七年六月

元亨利貞

王震

好維護世界和平
發展中日和平友
師教育子孫後代
前事不忘後世之
研究中日关系史

目 录

正确对待历史 总结经验教训

——记北京市中日关系史研究会第一届学术年会…… 1

“七七事变”回忆…… 6

和平民主势力必胜

——纪念“七七事变”五十周年…… 10

必须还历史的本来面目

——评述日本历史界对“十五年战争”的研究…… 14

论“七七事变”…… 31

“卢沟桥事变”的真相…… 51

平西抗日游击队史略…… 62

浅谈汪精卫集团叛国投敌的主要原因…… 88

抗战初期吴佩孚为什么未出任伪职…… 96

论北平沦陷初期的地方维持会…… 105

战争史上的奇迹…… 113

回忆延安时期的中日人民友谊…… 128

中日战争中日本人民的反战运动…… 134

纪念“七七事变”五十周年

——缅怀反对侵略战争的松本龟次郎先生…… 152

师生、战友情谊深

——记日本法学家吉田先生参加北平地下党领导的

反战活动片断…… 168

情重于山 仇深似海 碧血鉴千古

——郁达夫与日本…… 174

纪念日中战争爆发五十周年

——对日中关系的思考…… 189

正确对待历史 总结经验教训

——记北京市中日关系史研究会第一届学术年会

熊 杰

北京市中日关系史研究会于1986年8月21日至23日举行了以“七七事变”和抗日战争为主题的第一届学术年会，出席代表一百余人，收到论文二十三篇。到会者既有多年从事中日关系史研究的老一辈专家学者，也有年富力强的中年研究者，还有不少有志于中日关系史研究的年轻同志。大会由副会长陈抗主持并致开幕词，会长陈昊苏、名誉会长周一良出席并作重要讲话。中国中日关系史研究会会长孙尚清、副会长爱新觉罗·溥杰、沙里、赵安博到会祝贺并讲话。日本驻华大使馆文化参赞大和滋雄应邀出席大会并致贺词，文化专员天儿慧在会上作了专题发言。

全体代表在两天的讨论中首先学习了《人民日报》发表的发展中日友好关系的四点意见，代表们一致认为，这个意见在现实政治生活中，对巩固和发展两国关系，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在中日关系史的研究中，也有重要的理论参考价值，代表们分为历史、社会政治经济、文化艺术和科学技术四组，就所提交论文和中日关系史研究的一些问题，进行了专业性的深入讨论。

正确对待历史，总结经验教训

大家认为，近代长达半个世纪的两国对立，给中国人民带来了深重的灾难和巨大的损失，同时也给日本人民带来了极大的不幸，两国人民都应该吸取这些用血的代价换来的惨痛教训。今天，中日两国人民的友好关系是建筑在承认和正确对待历史的基础之上的，任何歪曲历史，企图翻历史案的作法，只能起到破坏两国人民友好感情，损害两国关系的消极作用。吕乃澄《“卢沟桥事变”的真相》、张峰《论“七七事变”》、徐乃娟《从“七七事变”浅谈日本军国主义侵华史》三篇文章以大量的、确凿的历史事实，揭露了日军发动“卢沟桥事变”的真相。认为“卢沟桥事变”是日军有计划、有组织和蓄谋已久的侵华军事行动，是日本帝国主义对外侵略、对外扩张的必然行动。李玉《一八六八年——一九三一年日本对华经济扩张》一文，以大量的数据分析了日本对华经济扩张是怎样完成由以商品输出为主转变为以资本输出为主的过程，指出日本对华的经济扩张是与战争紧密相联的。赵红《论北平沦陷初期的地方维持会》一文，论述了北平地方维持会是日本侵略者为宠络人心而采取的“怀柔”政策，但在客观上于稳定当时的社会秩序起了一定的积极作用。张历历《试日本岸信介内阁的对华政策》就岸信介内阁时期执行的敌对、歧视新中国的政策，特别是“长崎国旗事件”，使中日关系严重衰退，最后导致几乎完全中断，进行了历史的分析。认为这一敌视中国的政策给中日关系的发展，带来了严重的危害。代表们认为，研究中日关系史，无论友好史还是非友好史，都要客观地反映出来。过去由于极“左”思潮的影响，在中

日关系史研究中对一些历史问题不能实事求是地对待，或回避或掩盖，使正常的学术研究受到影响。如抗日战争，只讲八路军、新四军敌后战场，而不提国民党战场；战后中日关系史只讲大陆，不讲台湾。还有出于现实政治的需要，只讲友好，不讲战争等等都是非科学的、非唯物主义的，是今后在学术研究中要避免的。只有如实地反映历史，才能使两国人民和子孙后代汲取历史教训，更好地发展友好关系。

中日文化交流源远流长，人民友谊情深似海

中日两国在文化上有着很深的关系，正由于这一关系促进了人民感情的交融。杨曾文《最澄和日本天台宗》介绍了中国的天台宗传入日本以及在日本发展的情况。李苏平、卞崇道《中日哲学互融涓滴——古代部分》论述了在古代中国儒、释、道三教传入日本，与日本民族固有文化思想相结合，给日本社会的发展以推动。李芒《和歌、俳句、汉诗、汉译》、王晓平《日本谣曲〈白乐天〉、〈邯郸〉、〈昭君〉初探》两篇文章论述了中国古代文学对日本的影响，以及日本对这些外来文化加以吸收、消化，最后创造出不同于前者的，具有日本民族特色的东西。郭存爱《〈源氏物语〉与〈红楼梦〉比较研究》，从比较文学的角度，对《源氏物语》与《红楼梦》这两部东方文学的双璧进行了分析。

金狮《战争史上的奇迹》、郭奇《回忆延安时期的中日人民友谊》、张力《师生、战友情谊深——记日本法学家吉田先生参加北平地下党领导的反战活动片断》生动地反映了抗日战争时期，日本人民的反战运动以及战争期间的两国人民友谊。

此外，吕艺《论(日本)河田黑(静嘉堂秘籍志)》、钟少华《中日近代文化交流一奇葩——介绍〈编译普通教育百科全书〉》、林文军《“中体西用”与“文明开化”》、李德纯《论日本战后文学派》、安源《情重于山、仇深似海，碧血鉴千古——郁达夫与日本》、唐磊《为中日友好架设桥梁的人——记石仓武四郎先生》等文章都从不同的角度对中日文化交流和两国人民之间的友谊进行了论述和探讨。

中日关系史研究今后的对象和任务

在讨论会上对于中日关系史研究今后的对象，杨正光同志作了一个有代表性的发言，他说，中日关系史研究的对象应该是多层次、多角度、多方面的，应该包括两国政治、经济、军事、科技、文化艺术、体育卫生，以及政府、民间、宗教党派、学术团体、知名人士之间的交往等，也就是说，包括发生在中日两国之间的一切关系。这个发言得到绝大多数代表的赞同。与会代表还一致表示，日台关系是我国地方政府与日本政府之间的关系，自然应该包括在中日关系史研究范畴之内，而我们在这方面是一个空白，今后要加强这一方面的研究。周一良教授强调我们对中日关系史的研究，要研究其深邃的东西，不要浮于表面。孙尚清教授谈到要加强中日经济关系史的研究，至少近百年来中日两国所发生的事，都可以从经济方面找到原因。

在谈到中日关系史研究今后的任务时，陈昊苏同志认为，要认真发展中日友好关系的四点意见，要抓紧时间四点意见提供理论依据，用史实加以补充。代表们认为研究会在今后二、三年内应组织力量，编写一套《中日关系史丛书》，

分门别类地介绍有关基础知识，为青年同志提供较好的入门读物；北京市的中日关系史研究应该借助首都的优势，加强与日本地方之间的学术交流，争取能够进行合作研究。日本驻华使馆文化专员天儿慧先生也有同样的想法，他认为，如果中日两国学者就中日关系史的某一课题进行合作研究，并能搞出一个双方都能接受的研究成果，这将有重大和深远的意义。

今后的研究应该加强横向联系，不能把目光仅仅放在中日两国，还应注意吸收欧美、苏联等国对中日关系史的研究成果，注意加强与他们之间的学术交流。也要与台湾、港澳地区的学者们加强学术交流。

本届年会自始至终洋溢着浓厚的学术空气，代表们在“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思想指导下，各抒己见，畅所欲言，充分发表自己的观点和意见，进行学术交流，使年会达到了预期效果。刚刚到达北京就赶来参加闭幕式的日本广岛大学教授小林文男也发了言，他就当前发生在中日两国之间的重大政治问题，阐述了自己的立场和观点，并且表示愿在有生之年为中日青年之间的友好交往做出努力。

“七七事变”回忆

徐远棋

“七七”事变发生的时候，我正在从欧洲返国的途中，七月八日我所乘坐的英国船停靠在孟买码头，我因钢笔遗失多感不便，便上岸去买钢笔。那时巴基斯坦人尚未与印度人分离，但是宗教矛盾、民族矛盾已十分激烈。在我选好钢笔正准备付钱时，店门外的大街上忽然间一片混战，店主人不容分说地将我赶了出来，我下意识地握着不花钱的钢笔，小心翼翼地避开混战的人们，匆匆返回船上，这时在我舱里的书桌上已摆了两纸电文，一是北京路透社的消息：七月七日北平发生卢沟桥事变；一是来自伦敦的评论：中日之间的战争将要长期打下去。我马上意识到，这两则消息对我们中国意味着什么。

日本帝国主义霸占中国的野心，早已有之。还在我求学于日本的时候，就深深感到，日本政府及一些日本人对我们中华民族的蔑视和瞧不起。个人荣辱与国家强弱连在一起，且自卫之心人皆有之。从此，我便抱着不相信日本的态度，审视着中日关系中哪怕是极微妙的变化。三十年代初，日本帝国主义发动“九·一八”事变，强占了我国东北三省，我和我的留日同仁们一致认为，占领东三省远不是日本的目的；

要想不做亡国奴，也远远不限于东三省的人民。于是我们发起了日本研究会，创办了《日本评论》，后来又出版了《中国新论》等刊物，向我国人民介绍时局变化，揭露日本的侵略面目，以激起人们对日本帝国主义侵华行径的警觉。果不出我们所料，日本帝国主义的侵华步伐以加速度行进着，短短的六年时间，便将战火引向华北以至整个中国。我归心似箭，恨不得马上投身到抗日战争中去。

从孟买经过香港到上海已是十几天以后了，候在码头上迎接我的，有我的夫人，有老朋友蔡叔厚，还有教育部总务司司长雷震。我对老雷讲，“你这么客气做什么？”他说：“我不是客气。日本人在华北开战后，平津等地的学生纷纷来到南京，其中有毕业的，也有在校的，有大学里的、也有高中生；有要求抗日的，有向政府要事情做的，也有希望继续读书的。部长（王世杰）请你马上回去。”这样我就赶到南京，去招呼学生。上海失陷后，上海甚至武汉等地的学生都来找南京教育部，学生人数二万多。其时南京的形势也十分紧张，留在南京似乎已没有什么必要，我决定到军队中去。

平型关大捷，向人们展示了共产党领导的人民军队的力量，汤恩伯从南口经晋北撤回南京后，也想用共产党人的办法治理军队。他来找我，请我帮他办一个军政干部训练班。我同意了。我交待完教育部的工作，便选了一批学生来到许昌。

汤恩伯亲自挂帅做训练班的主任，蔡剑鸣做教育长，我做总教官。训练班的任务主要是为二十军团训练军政干部，同时进行瓦解日军的宣传工作。由于学员们都是青年人，抗战热情很高，我带领他们学习理论、演习军事、对付日本刺探。我还和学生们一起做了许多宣传品。宣传品是用日语书

写的，印刷在五彩的道林纸上，加上一些从第三厅郭沫若处运来的宣传品，由学员们偷偷地送到日本人的军队里。

台儿庄战役打胜后，汤恩伯从前线打电报来叫我去。两人一见面，他就先向我道喜。原来他的部下从俘虏的日本兵的衣袋里，翻出了训练班散发的宣传品。由此他认定台儿庄一战的胜利，我也是很有功的，并且把这件事汇报到蒋介石那里。没过多久，我受到蒋介石的召见。

记得是汤恩伯陪我去的。召见的时间很短，蒋介石称赞了几句，随即批了条子“任命徐逸樵同志为第三十一集团军政治部主任”（二十军团后改编为三十一集团军），并嘱我造一个人员编制及经费开支计划报上去，对我来说，这无疑来得有些突然。我不要说没有这方面的经验，连精神准备也没有。汤恩伯却是很高兴，对我说，一切由他去办。结果编制造得很大，预算每月近十万元，这份计划送到总政治部主任陈诚那里，以后就没有下文了。

集团军的政治部主任是中将军阶，而各师的政训处长都是黄埔三、四期的毕业生，至少也是少将，对我自有不服，工作不好做，加上经费又始终没批下来，我很是气恼。汤恩伯出钱帮忙维持了三、四个月，这时日本人已开始了对武汉的围攻，汤恩伯的军队调到武汉东面的大冶、阳新一带，我从前线回到武汉，亲自去找陈诚（陈又是第九战区司令，负责大武汉的保卫）。陈诚说不知道有这回事。我一听就火了，对他说：“作为部长，你可以不知道的么？”我也不管他尴尬不尴尬，对他说，我不干了。陈诚说“逸樵同志，军队里是不准辞职的”，我说：“军队里有开小差，我就开小差好了。”

在以后抗战的年代里，我还曾几次穿起过军装，有时探

帮汤恩伯、有时帮帮蒋鼎文，但从事的工作总离不开培训军政干部和主办宣传这两项。我当时的想法就是一个：要战胜日本帝国主义，中国的军队必须提高素质，严明纪律，加强战斗力。然而，最终我失望了。于胜利前夕，最后离开了军队。